

# 「士魂商才」——

##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 日譯本自序

● 余英時



《中國近世の宗教倫理と商人精神》，  
森紀子譯。日本東京：平凡社，  
1991年4月。

平凡社接受了島田虔次先生的建議，決定把《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譯成日文出版。這件事給予我意外的喜悅和榮幸。我研究中國文化史和思想史已經三十多年了。這三十多年中，我一直受到日本漢學家著作的教益。讀者不難在本書中發現，如果沒有日本學者的豐富業績，這本小書是無法寫成的。所以我特別高興這部日譯本能呈現於日本學界之前，算作我的一種回報。

這本書主要是討論明清時代儒家思想和商人階層的興起之間的交互影響。這是以前研究中國思想史或社會史的人所不很注意的一個方面。但是這個問題太大，不是這部小書所能講得清楚的。我的希望是在這一新的史學園地中做一點拓荒的工作，因此我期待着更多的史學家，特別是日本學者，來共同耕耘。我深信將來的收穫一定是豐碩的。

中國本土原始智慧的再發現和新發展是由新禪宗促成的。

十五、六世紀以來，許多「士」竟成為「商」的代言人；所謂商人的意識形態其實是通過「士」的筆或舌而建立起來的。

##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

我在本書中雖然強調了儒家倫理的重要作用，但是我所說的儒家是宋明以下的新儒家，其中已吸收了佛教的成分，特別是新禪宗的影響。宋明儒學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心性論，因此也具有明顯的內傾性格。宋明心性論的最後根據當然是原始儒家的經典，特別是《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這部宋以後所謂「四書」都是在佛教進入中國以前撰成的，代表了中國本土的智慧。然而不可否認的，這一原始智慧的再發現和新發展是由新禪宗促成的。韓愈（768-824）受了新禪宗的啟示，因此才致力於重建儒家的道統。他和李翱（774-836）兩人共同提倡儒家關於心、性的學說。雖然他們（尤其是李翱）並沒有能夠完全擺脫掉佛教的觀點，但是他們的終極目的是要從佛教手中奪回儒家久已失去的陣地。因為從南北朝到隋唐這一長時期中，中國知識人大體上都相信儒家是只管「治身」的，也就是「世間」的學問；而佛教則是「治心」的，也就是「出世」的學問。「出世」比「世間」更為根本。

但是韓、李兩人的努力在當時並沒有發生重要的影響。在他們死後不久，張彥遠在咸通二年（861）所撰的〈三祖大師碑陰記〉中說（《全唐文》卷七九〇）：

夫稟儒道以理身理人，奉釋氏以修心修性，其揆一也。

可見「身」屬儒家、「心、性」屬釋家的兩分觀念還是很流行的。而且一

直到北宋初期，情況依然未變，所以智圓（976-1022）說（《閑居編》卷一九〈中庸子傳〉）：

儒者飾身之教，故謂之外典；釋者修心之教，故謂之內典也。

這是宋代新儒家轉向內傾的思想背景。明白了這一層關係，我們便不難看出，新儒家一方面固然成功地取代了新禪宗，另一方面也融會了新禪宗的精神，和漢代以前的舊儒家不盡相同了。本書泛稱「近世宗教倫理」，而不用「儒家倫理」的專名，其道理便在這裏。

### 「棄儒就賈」和「士魂商才」

其次，本書的另一重點是討論商人的精神。中國的商人階層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便已出現在歷史的舞台。秦漢以下，商人也一直都在社會上活躍。那麼，我們為甚麼要特別重視明清的商人呢？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商和士之間的互相流動開始變得非常密切了，而另一方面商人階層又明確地形成了自己的意識形態（ideology）。換句話說，商人在中國的社會價值系統中正式地上升了。士、農、工、商的傳統秩序漸漸轉變為士、商、農、工的新秩序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十五、六世紀以來，許多「士」竟成為「商」的代言人；所謂商人的意識形態其實是通過「士」的筆或舌而建立起來的。甚至像王陽明這樣的大哲學家、像李夢陽這樣的大文學家也開始給商人寫墓誌銘，並且說：「四

民異業而同道」或「士商異術而同心」了。王陽明以後，明清的重要文集中，常常可以找到有關商人的記載；中國的社會結構在不知不覺中已發生了一個很基本的變化。我在本書中曾列舉了許多例證。但是我願意借這個機會再補充一條極重要的資料。唐順之（1507-1560）在〈答王遵巖〉中說（《荊川先生文集》卷六）：

僕居閒偶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喫，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如生而飯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唐、漢以前亦絕無此事。

「屠沽細人」是小商人，但人人死後都有一篇墓誌。這一普遍的現象最可以說明當時商人階層的心理：他們不但已不再自慚形穢，而且相信自己 and 立功、立德、立言的大人物一樣，也可以「不朽」了。唐順之明說這是以前所絕無之事，更證明商人墓誌銘的大量出現確是明代中期以後的新發展。唐順之既對商人這樣輕視，照理說他自己是不會給商人寫墓誌的了。可是有趣得很，他的文集中至少便有兩篇商人的傳記：一篇是為新安商人程楷（1469-1524）所寫的〈程少君行狀〉（《文集》卷十五），另一篇是為揚州鹽商葛欽之的妻子所寫的〈葛母傳〉（卷十六）。不用說，這兩篇傳記都是很恭維他們的。在〈葛母傳〉中，作者更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事實：葛母不但送她的兒子到南京去向湛若水問學，而且還出了數百金為湛若水在揚州建修了甘泉書

院。這件事是我們以前所不知道的：它為商人和儒學的關係提供了新證據。唐順之的《文集》更證實了本書基本論點。

十五世紀以來，「棄儒就賈」是中國社會史上普遍的新現象。不但商人多從士人中來，而且士人也往往出身商賈家庭。所以十九世紀的沈垚說：「天下之士多出於商。」最近讀到漢譯本：澁澤榮一《論語與算盤》，我十分欣賞他所創造的「士魂商才」的觀念。明清的中國也可以說是一個「士魂商才」的時代，不過中國的「士」不是「武士」而是「儒士」罷了。看來在中、日兩國的近世史和現代史上，「士魂商才」是一個共同的重大課題，值得歷史家共同研究和互相印證。

懷着對於中、日史學攜手並進的熱烈願望，我謹以此書獻給日本的讀者。

余英時 安徽潛山人，香港新亞書院文史系第一屆畢業生，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歷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等職。余教授自1987年起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講座教授，當代著名的中國文化史與思想史學者。著述宏富，影響巨大，包括《後漢的生死觀》、《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等多種專著與論文。余教授於1974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明清的中國也可以說是一個「士魂商才」的時代，不過中國的「士」不是「武士」而是「儒士」罷了。